

遗忘与发掘:历史记忆与西班牙政治发展

谈火生

【摘要】历史记忆关乎一个国家的集体认同,但对于暴力历史的记忆则可能激发人们之间的仇恨,对集体认同构成威胁。西班牙在民主转型初期,通过“遗忘公约”为民主转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在政党竞争、央地关系和民间社会的共同推动下,这种缺乏正义的历史记忆策略在民主巩固之后转向“发掘”,2007年通过的《历史记忆法》使历史记忆工作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如何把握好历史记忆与正义之间的平衡,仍考验着西班牙人的政治智慧。

【关键词】历史记忆;“遗忘公约”;发掘策略;民主转型

【作者简介】谈火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24.3.118~131

在民主化研究领域,西班牙是一个经典案例,这不仅因为它与近邻葡萄牙构成了第三波民主化的开端,并树立了“共识型”民主转型模式的典范,而且因为它在转型过程中通过“遗忘公约”(Pacto del Olvido)成功地实现了民主巩固。因此,在大量关于西班牙政治发展的研究中,共识型转型、遗忘策略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重要的议题。中文学界对西班牙的共识型转型并不陌生,但其遗忘策略及其后续反应,中文文献鲜有讨论。^①本文尝试梳理西班牙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对历史记忆问题的处理策略的变化,观察历史记忆与西班牙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

历史记忆并非自发的社会产物,也不是各种不同因素随机作用的结果,而是一个主动的社会建构过程,是一系列选择性实践的结果。因此,历史记忆并不取决于历史事实本身,而取决于人们是如何记忆这些事实的。历史记忆问题关乎一个国家能否保持民众的支持,因为民众此前被他们对历史的记忆割裂了。就本文所讨论的西班牙而言,在民主转型及其巩固的过程中,它所面临的历史记忆问题主要指关于内战的记忆(1936-1939年)和对佛朗哥时期独裁统治的记忆。对这两段历史的记忆之所以成为问

题,是因为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不仅西班牙人遭受了巨大的伤害,^②而且整个国家被分裂为两个阵营,一部分人是施害者,一部分人是受害者。双方对这两段历史有不同的记忆,他们对这两段历史的解释迥异。新兴的民主政权在处理这两段历史时,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激活人们心中的仇恨和集体罪恶感,这不仅无法有效建立国家的集体认同,而且会对民主化进程构成障碍。这是西班牙人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处理历史记忆问题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约束性条件。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西班牙人小心翼翼地对待这两段历史,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其记忆策略经历了从“遗忘”到“发掘”的转变。在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开启了民主转型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以上历史所采取的记忆策略是“遗忘”,即有意识地将这两段历史封存起来。但是,2000年前后,民间和政界都启动了对这两段痛苦记忆的发掘行动,并于2007年通过了《历史记忆法》(Ley de Memoria Histórica)。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是这两种历史记忆策略与西班牙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西班牙政治发展如何影响了西班牙人对历史记忆的

策略选择;另一方面,这两种历史记忆策略对于西班牙政治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的讨论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叙述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遗忘策略的形成及其发展;第二部分分析遗忘策略产生的原因及其成功实施的条件;第三部分讨论民间社会和政党竞争如何推动记忆策略从“遗忘”向“发掘”转变;在文章的结论部分,本文将从比较的视角探讨西班牙经验的独特意义。

遗忘策略与民主巩固

按照安德鲁·瑞格比的分类,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有四种处理过去政治遗产的基本策略:第一种策略是审判和清洗,如二战后欧洲的纽伦堡审判、东欧剧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清洗行动;第二种策略是以真相换大赦,并最终实现和解,如拉美各国和南非建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第三种策略是赔偿和补偿,如智利和南非等很多国家都采取了相关的措施;第四种策略是遗忘,将令人不快的过去封存起来,佛朗哥去世后的西班牙即是这一策略的代表。^③这四种策略的严厉程度依次递减。

值得注意的是,同是西班牙,1939年佛朗哥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后,他采取的方式是清洗,通过大规模的镇压行动,残酷地处置了失败的共和主义者。据估计,佛朗哥政权处决的人数大约有5万,被关进集中营的人数达到30万,还有几十万人被迫流亡海外。^④但是,在佛朗哥去世后,佛朗哥独裁政权的主要文官机构和军事机构都被继承下来,并没有在佛朗哥去世后即遭到清洗。既没有“真相委员会”,也没有审判,没有追究谁应该为独裁时期的死亡、折磨和非法拘禁负责。这一点让政治学家们感到非常吃惊。^⑤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佛朗哥时期的清洗策略催生了后佛朗哥时期的遗忘策略。因为佛朗哥时期的清洗策略深刻地影响了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并逐渐形成了一种躲避文化,人们频繁地变换居住地,试图躲避严酷的真实世界。就像当时的讽刺歌星孔奇塔·皮克尔所唱的:“我不想知道,邻居不要告诉我,我宁愿生活在梦中,在那里寻求真理。”^⑥

这种糟糕的经历让西班牙人心有余悸并深刻地体会到,清洗并不能在国家建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兴的民主政权要想避免政治极化,实现广泛的共识,就有必要避免在政治领域直接处理那段独裁的历史,以免激活复仇的观念和集体罪恶感。^⑦对于西班牙人来说,在民主转型阶段,“遗忘过去”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唯此,他们才能安然地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对于这一点,即使是那些在21世纪努力发掘历史记忆的人也是承认的,记忆论坛的组织者就坦陈:对于民主转型而言,沉默公约是必要的。这保证了民主化的顺利进行,它使得西班牙规避了因对前政权进行审判所带来的不稳定。^⑧

在这种背景下,政治精英达成了一颗心照不宣的共识:未来才是开启现行民主国家的唯一合法性源头。就像时任首相苏亚雷斯所言:“问题不是问人们从哪里来,而是问他们要向哪里去。”为此,应忘记大部分过去的伤痛,采取一种选择性记忆缺失的立场,打开西班牙历史新的一页。其具体措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不让独裁主义的过去进入政治讨论。其最好的证明是,在公共领域内,西班牙人从来不讨论和提及佛朗哥时期的问题。在受害者家内,他们可能对佛朗哥时期的拷打和杀戮怀有不满,但是,这种私下的怨恨没有公开表露出来并形成集体的记忆。第二,破旧立新,创建新的公共象征。佛朗哥时期的殉难谷纪念馆不再开放,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方自治省内的所有佛朗哥时期的标志物全部被清除。老的纪念民族主义胜利的节日被取消或赋予其他的意义,“胜利节”改为“建军节”,纪念所有过去和现在的民族主义战士和共和主义战士。^⑨第三,实现全面大赦。1977年10月14日,新选举产生的西班牙议会签署了《特赦法》(Ley de Amnistía),不仅赦免了内战中的暴力行为,还赦免了佛朗哥政权在1936年至1977年期间实施的所有暴力行为。同时,还建起一道屏障,放弃了通过司法手段来清算过去的做法,使得司法程序不触及独裁统治的历史。这可能完全抹去独裁统治的痕迹,让年轻一代西班牙人忘记佛

朗哥。^⑩

需要说明的是,用“遗忘公约”来形容民主转型时期西班牙人的历史记忆策略不完全准确,起码在两个方面,“遗忘公约”并没有反映事实。其一,当时人们对待过去历史的态度存在地区差异。例如,巴斯克地区的激进民族主义组织就公开要求对佛朗哥时期的精英进行清洗。^⑪而且,为纪念近几十年来巴斯克地区发生的各种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人们竖立了各种各样的牌匾和纪念碑。^⑫其二,所谓的“遗忘”只是媒体在公开的场合不提及这些事情,但人民并没有选择遗忘。在转型的最初几年,恢复历史记忆的努力时有发生。当时,对第二共和时期的死难者心怀敬意的人常常自发地主动帮助受害者的家属。但是,在1981年的军事政变之后,这些行为中断了。人民相信,西班牙新生的民主无力承受直面历史所带来的重负。^⑬

面对分裂的历史,西班牙人所采取的遗忘策略在民主巩固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遗忘策略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性来促进民主化。如前所述,在佛朗哥去世前后,西班牙的不确定性主要集中在威权国家的残余势力,尤其是军队。如果条件恶化,军队作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随时有可能颠覆新生的民主政权。对此,西班牙人心知肚明。他们通过对过去的严密封存,换取了那些有能力破坏民主化的力量对于民主化进程的默许。第二,遗忘策略使各种政治势力能够集中精力完成巩固民主的任务,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西班牙民主化的诸多挑战,特别是如何在中央集权国家的框架内满足地方自治的要求。第三,遗忘也助长了西班牙历史上薄弱而分裂的民族意识。对导致内战和佛朗哥独裁统治事件的记忆进行有意的压制,促进了西班牙人将自己重新想象成一个现代的欧洲国家。如果国家一心扑在分裂的历史问题上,很难想象这种新的构想如何能够浮现出来。^⑭

西班牙人将民主化优先于和解,暂时将“与过去和解”的问题冻结起来,这促进了西班牙政体变迁的

平稳过渡,为西班牙民主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很多学者都将遗忘策略视为西班牙新兴民主政体政治成熟的标志。

内战记忆、佛朗哥改革与遗忘策略

对此,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人为什么会选择遗忘策略?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结构化因素和行为者因素两个方面来加以观察。

已有学者指出,最初的转型协议是当时条件下政治机会结构的产物。当时,最突出的特征是害怕冲突,这既是内战创伤记忆的结果,也是转型初期暴力事件频发的结果。对冲突的恐惧使得精英和民众都产生了“规避风险”的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遗忘的意愿”。^⑮除了这两项因素之外,还有一项因素——佛朗哥后期经济改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结构化因素有三:内战记忆、佛朗哥后期的经济改革和转型时期持续存在的威胁。

首先是内战记忆。很多学者都强调内战经验的重要性,认为内战教会了政治精英们以温和的方式为未来的民主开路。但是,内战经验并不必然指向温和之路,相反,它很容易引导人们走上报复之路。无论是在西班牙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不乏例证。温和化只是内战经验的一种可能性。^⑯事实上,佛朗哥去世之初,大多数反对派政党也确实考虑过对独裁时期的文官政府和军事组织进行清洗,但是,最后他们都放弃了将这种诉求写入其政治规划。因此,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西班牙精英通过内战经验学会了这一技巧。对此,劳拉·德斯福·埃德尔斯(Laura Desfor Edles)给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西班牙的大众媒体对内战的“惨状”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这在20世纪欧洲历史上是第一次。人们每天都从媒体上读到关于内战的报道,他们对内战血腥后果的感知塑造了战争双方对于战争之恶的认知,很多西班牙人认识到,“我们遭遇了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⑰这种创伤记忆使得西班牙人在转型期间不愿回首内战,不愿重蹈覆辙,不愿意看到因

纠缠于历史而可能带来的社会极化和国家分裂。在当时西班牙人的心目中,民主和民族和解位于神圣的一端,内战则位于褻渎的一端。因此,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同意,历史上最痛苦的这一页不应该进入公共讨论。内战只能用于促进社会和政治共识。1986年,在内战爆发50周年的纪念日,西班牙政府发表了一个官方声明,称“内战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毫无疑问,西班牙内战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西班牙社会希望忘记内战的创伤,我们纪念内战是为了防止“战争和仇恨的幽灵”再次笼罩西班牙。^⑧

其次是佛朗哥后期的改革。如果说内战经验为西班牙人提供的是负面体验的话,那么,佛朗哥后期的改革则为西班牙人提供了正面体验。1957-1969年是佛朗哥统治的核心阶段,在这一时期,佛朗哥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军队和个人独裁的统治方式,加强了政权的制度化,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透明化、经济改革和自由化。这一时期,西班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人们通常称之为“西班牙奇迹”。在1961-1973年间,西班牙的GDP以年均7.5%的速度递增,经济结构也发生转型。到20世纪70年代初,西班牙已经成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人均年收入超过2000美元,进入富裕国家行列。与之相应,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提升,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⑨因此,当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启动的民主化进程与20世纪30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富裕的生活和一个新的多数阶级(中产阶级)的崛起为民主化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刚刚体验了富裕生活的西班牙人不愿意再回到令人恐惧的过去。就像帕洛玛·阿奎拉尔(Paloma Aguilar)所言,如果没有佛朗哥时期的社会转型,西班牙民主转型要想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是非常困难的。^⑩

最后是转型时期持续存在的威胁。佛朗哥去世后,鉴于西班牙历史上存在和平一再丧失的经历,以及民众对旧政权态度的不确定性,很多人对西班牙的政治前景很不乐观。雷蒙德·卡尔(Raymond Carr),

一位在西班牙研究领域颇有声望的学者,在1997年公开承认,在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最初几年里,他非常担心西班牙的局势会变得更糟。因为转型期间社会运动频发,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的对抗时有发生,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恐怖主义不时有所行动。^⑪1976年,佛朗哥去世后的第一年,罢工次数达到1568次,有360万工人参加,其人数是1975年的6.54倍,也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多的一年。^⑫这种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完全可以用风起云涌来形容。按照阿奎拉尔的评估,西班牙在民主化过程中所经历的暴力程度远甚于当时其他的民主化国家,如其近邻葡萄牙和希腊。^⑬更糟糕的是,作为佛朗哥残余势力的军队余威犹存,随时可能对新兴民主政体构成威胁,1981年的军事政变即是明证。政变引发了政治地震,它使西班牙人意识到,已经建立的民主政体仍然处于佛朗哥政权历史遗产的威胁之中,仍然需要进一步巩固。它也提醒人民和政治家,共识政治任重道远,不要将历史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政变强化了“遗忘公约”,使人们不再去碰“佛朗哥时期历史”这个敏感的话题。^⑭

从行为者因素来观察,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希望内战永不再来,希望实现民族和解,所有的努力都旨在构建一个制度框架,将共识制度化,并防止过去的错误重演。

从政治精英的维度看,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最积极推动“遗忘公约”的政治力量是左翼的反对派和佛朗哥政权的残余势力。佛朗哥政权的残余势力支持“遗忘公约”很好理解,因为他们在佛朗哥时期是加害者,害怕遭到新政权的清洗,就像葡萄牙和希腊刚刚发生的那样。但是,左翼的反对派在佛朗哥时期是受害者,他们为什么也积极推动“遗忘公约”,而不是审判和清洗呢?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害怕军事政变对民主政体构成威胁。事实上,在1977-1981年间,曾有数次军事政变的图谋,尽管最后付诸实施的只有1981年2月的那一次。^⑮二是左翼政党自身斗争策略的调整。其实,

早在佛朗哥时期,左翼的西班牙共产党就转向了“全国和解”的政策,决定放弃通过革命推翻佛朗哥政权的策略,愿意通过谈判、协商与所有“赞成全国和解的”政治团体进行联合。^⑤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策略转变对于后来的民主转型是非常关键的。^⑥进入民主转型阶段后,西共领导人卡里略明确表示:“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谈论民族和解,谈论超越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分野,谈论埋葬战争之斧——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最早提出的。”从国外流亡回到西班牙的共产党候选人拉斐尔·阿尔贝蒂(Rafael Alberti)也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紧握拳头离开祖国,因为我的祖国陷入了内战;今天,我回来了,张开双臂拥抱我的兄弟。”^⑦

正是左翼和右翼两方面的态度共同构成了“遗忘公约”的基础,并对整个转型过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⑧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基础,1977年制定《特赦法》时,在议会辩论期间,几乎所有团体都称赞该法,因为它是“民族和解”的工具,旨在“结束过去”,并开启一个新的历史进程。^⑨

从普通民众的维度看,如果说政治精英的政治审慎为遗忘策略的选择奠定了政治基础,并最终导致“遗忘公约”的诞生,那么,普通民众的政治态度则为“遗忘公约”的形成奠定了民意基础。

尽管转型时期70%以上的西班牙人并没有直接经历过内战,但对内战的记忆却代代相传,作为苦难

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这种记忆得以延续并引起共鸣。因此,在佛朗哥去世之时,民众并没有广泛地要求起诉那些在独裁时期有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人。在1975-1977年的民意调查中,和平、秩序和稳定是当时西班牙人最关心的问题。^⑩值得注意的是,根据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的连续社会调查,民众对佛朗哥政权的看法并没有通常想象的那么负面。在社会调查中心1984年至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中,当民众被问到“您认为在西班牙过去60年中什么时候在政治上是最好的?”,民众对佛朗哥主义的评价竟然比内战前的民主体制还高。在1984年的调查中,只有5%的人认为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但有21%的人认为佛朗哥时期是最好的。而且,这一趋势从1984年一直持续到1990年(见表1)。这主要是因为内战前民主体制与内战的记忆是关联的,西班牙人认为,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民主制度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它才会最终走向内战。

民众的这一认知在1985-2000年的调查中得到了印证。当民众被问到他们对佛朗哥时期政治遗产的看法时,持否定态度的人数占比在1985年只有27.3%,这个比例是很低的,此时西班牙民主已然巩固,民主体制的建立已经有10年。对佛朗哥政权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的人数一直维持在45%左右,哪怕是到了2000年,民主转型已经25年之久,情况依旧如此(见下页表2)。这部分解释了在整个民主转型过

表1 “您认为在西班牙过去60年中什么时候在政治上是最好的?”(单位:%)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普里莫·德里维拉军事独裁时期	3	2	2	1	1	1	1
第二共和国时期	5	3	3	4	2	2	3
佛朗哥时期	21	16	15	15	12	7	8
今天的民主时代	58	58	62	62	67	77	76
不知道	9	18	13	13	13	10	10
没有回答	4	3	5	5	5	3	2
样本数(CIS, 社会调查中心)	1441	1495	1558	1715	1764	1851	1908

资料来源:Paloma Aguilar, "Institutional Legacie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The Case of the Spanish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Jeffrey K. Olick, (eds.), States of Memory: Continuities, Conflict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National Retrospe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8-160.

程中,为什么普通民众没有要求回溯性正义(retroactive justice),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即前文所述的弗朗哥后期的改革。

政党竞争、民间社会、央地关系与记忆的发掘

尽管遗忘策略被公认是西班牙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重要一环,但它也被很多学者批评作为一种“缺乏正义的转型”。^②因为它只是暂时将个人记忆隔绝于公共领域之外,将内战和弗朗哥时期的集体记忆“冰封”起来,这虽有助于实现政治和解,让西班牙人可以在一个政治框架中和平地处理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但无力实现社会和解,让双方克服相互之间的对立,真正弥合他们之间的社会分歧,那是一个更为广泛也更加困难的过程。因此,遗忘策略可行于一时,却难以行之长久,一旦当初的政治机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深埋在受害者内心深处的苦难记忆就会破土而出。25年后,随着西班牙民主的巩固,其历史记忆的策略逐渐由“遗忘”转向“发掘”。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00年10月对弗朗哥时期留下的无名尸坑进行了第一次科学的集中挖掘,将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暴露在世人的面前。这一事件引发了一场记忆爆炸运动,从此,西班牙人开始公开地讨论内战和弗朗哥时期独裁统治的后果。2007年10月,西班牙议会通过了《历史记忆法》,标志着西班牙历史记忆政策的重大转向。

遗忘策略是当时政治机会结构的产物,与此类似,发掘策略同样也是政治机会结构的产物。虽然说民主转型初期的遗忘策略将历史记忆暂时封存了起来,但是,内战没有被遗忘,弗朗哥时期的不义也

没有被遗忘,它们只是等待新的政治机会结构的来临。25年后,当民主政体已经巩固,变得足够强大并能够承受记忆的冲击时,它们就重新浮出水面。当然,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只是为历史记忆浮出水面提供了可能性,发掘策略的产生还有赖于民间社会的推动和政治体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的互动,其中,后者包含两个主要的动力:一是政党竞争,二是央地关系。

(一)政党竞争与沉默共识的裂痕

尽管有学者认为,在恢复历史记忆的问题上,西班牙的民间社会比政治精英们先知先觉,当民间社会已经着手“发掘”之时,政治精英们还“犹抱琵琶半遮面”,^③但是,这一观点既误解了政治精英和民间社会所遵循的不同逻辑,也没有准确地反映事实。事实上,记忆之争不仅是社会热议的话题,也是西班牙两大党派政治分歧的焦点。而且,沉默共识的裂痕首先就是由政党竞争撕开的。

1993年开始,在选举竞争中,左翼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打破了共识。工人社会党担心自己会在选举中输给保守派政党西班牙人民党,于是,工人社会党决定启用历史,将其作为打击对手的政治工具,因为西班牙人民党是与弗朗哥政权联系在一起的。工人社会党含沙射影地指出,如果西班牙人民党赢得胜利,民主将处于危险之中。实践证明,这一选举策略是有效的,工人社会党赢得了选举,但是,在工人社会党执政期间,历史记忆在实践上仍是沿用从前的一贯路线——尊重共识,并没有去发掘内战或弗朗哥时期的罪恶。^④

表2 公众对弗朗哥遗产的看法,1985-2000年(单位:%)

回答	1985	1987	1995	2000
肯定	17.7	16.7	11.2	10.4
否定	27.3	31.6	34	37.4
既有肯定也有否定	46.2	44.6	48.9	46.4
不知道	8.5	7.1	5.9	5.8

资料来源:Paloma Aguilar and Carsten Humlebaek,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Spanish Democracy", *History and Memory*, Vol. 14, No. 1/2(2002), pp. 121-144.

在1996年的选举中,尽管工人社会党故技重演,但是,三年前曾经奏效的策略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西班牙人民党候选人何塞·玛丽亚·阿斯纳(José María Aznar)在大选中获胜。面对已然撕开的裂口,作为民主转型以来首位执政的人民党领袖,阿斯纳不得不做出让步,将打破“记忆缄默”作为其施政措施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和工人社会党类似,人民党试图引导公共领域将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集中在具有“共识性”的国家历史问题上,有意回避记忆分裂的现实问题。

从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选举前和选举后的表现来看,打破“沉默”更多的是出于选举的考虑,是一种选举策略,一旦成功上位,马上将“共识”作为努力的方向,这与民间社会单纯追求转型正义的逻辑显然不同。即便如此,其政治操作仍产生了预期之外的后果,因为裂痕一旦撕开,就很难自动愈合。随着各派政治势力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一策略,其手段也越来越激进,裂痕也越撕越大。

1999年9月,西班牙议会第一次讨论了一个谴责独裁政权历史的提案。如果说选举竞争在议会之外抛弃了非正式共识,那么,此次提案是第一次在议会内部打破了这种共识。独裁时期的历史变成了一个政治议题,所谓的共识也不复存在了。人民党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认为揭开旧伤疤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⑤2002年,执政的人民党做出妥协,与其他政党一起通过了一项声明,第一次谴责当年佛朗哥发动的军事政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终结议会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⑥

但是,人民党的愿望没有实现。2004年,又值大选之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选举中将“历史记忆的复苏”作为竞选策略,并在大选中获得胜利。时隔8年重新上台的工人社会党政府积极推动恢复历史记忆的工作。200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70周年,西班牙首相、工人社会党领导人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出席内战反思活动,成为战后第一个参加内战纪念活动的政

府首脑。不仅如此,在活动中,萨帕特罗还宣布将2006年称作纪念内战受害者的“历史记忆年”。尽管人民党一直强烈反对工人社会党政府的这一政策,但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讨论,工人社会党最终与多个小党派就《历史记忆法》的具体内容达成了妥协。2007年10月31日,在没有人民党和加泰罗尼亚共和党左翼的支持下,西班牙议会通过了《历史记忆法》。^⑦至此,内战和佛朗哥独裁时期的历史记忆正式进入政治法律话语中,恢复历史记忆的进程全面启动。

2011年,西班牙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在其执政期间冻结了本来用于资助民间组织进行发掘工作的公共资金,使寻找受难者遗骸的工作受到严重限制,恢复历史记忆的工作遭受挫折。^⑧

(二)民间社会与“发掘”

转型中的民主与巩固的民主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在巩固的民主中,政治冲突而不是政治共识成为常态。当民主已然巩固之时,民间社会着手恢复关于内战和佛朗哥时期独裁统治的历史记忆。

2000年,记者埃米利奥·席尔瓦(Emilio Silva)历经千辛万苦,在法医和当地村民的帮助下,在位于加利西亚西北部的村庄进行发掘,找到了1936年10月被国民军枪杀的祖父的骸骨。^⑨同年,他与圣地亚哥·马西亚斯(Santiago Macías)共同成立了非政府组织“恢复历史记忆协会”(Asociación para la Recuperación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以帮助内战和独裁统治时期受害者家属寻找遇难亲属的遗骸与历史记忆。自此,寻找和发掘遇难者遗骸工作成为西班牙民间团体开展的恢复历史记忆活动中的重要工作。有来自约20个国家的一千多名志愿者加入这一工作。据西班牙《公共报》报道,从2000年到2018年,“恢复历史记忆协会”共组织743项挖掘工作,共有9009名在佛朗哥时代受害者的遗骸被成功找回。^⑩这也是很多学者使用“发掘”(Digging Up或Unearthing)来形容西班牙恢复历史记忆运动的原因。“发掘”一词语带双关,既指对受害者遗骸的发掘,也指

对历史记忆的发掘。

民间社会在推动西班牙历史记忆策略转向的过程中,有两个面向值得注意。其一,代际转换为历史记忆的“发掘”提供了可能性和动力。罗伯特·波格·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在其著作《逝者为大》中对尸体的社会角色进行了反思:“没有什么比一具尸体更有活力了,尽管它是死寂的……一具尸体本身既不会令人不安,也不会让人产生联想。只有在其幸存的亲人那里,由于血缘、情感和亲属关系,冰冷的尸骸才成为超越的化身。”^④确实,内战和佛朗哥统治时期受害者的遗骸,除了他们的亲人,是没有人会去关注的。开启这一运动的记者埃米利奥·席尔瓦也正是在寻找其祖父遗骸的过程中,才意识到很多人都与他一样有着同样的牵挂,并着手推动成立“恢复历史记忆协会”。

需要指出的是,“发掘”工作开始之时(2000年),内战已经过去快70年,离佛朗哥统治结束也有25年,内战一代差不多都已故去,生活于佛朗哥时期的那一代人也都已步入晚年。年轻一代并没有经历过那可怖的岁月,他们出生之时正处在西班牙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和政治变革时期,他们接受的教育也与父辈完全不同。以描写佛朗哥政权闻名于世的西班牙作家哈维尔·马利亚斯在他的作品中就将这种代际差异表露无遗:面对父母的继续沉默,年轻人们认为“记忆是一种有力的政治工具,为现在与过去提供了一种契约,因此应该负起讨论佛朗哥主义的镇压、重建代际传承的责任”。^⑤他的《明日你的脸庞》三部曲和《坏事开头》致力于重现佛朗哥政权的历史真相,还原佛朗哥独裁政治对西班牙人造成的巨大伤害,并通过历史记忆的激活,提醒人们警惕政治叙事淹没历史记忆的意图。^⑥这表明,在新的政治环境下,西班牙社会对待历史记忆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利亚斯的小说可谓一场文学形式的“挖掘遗体”行动。

其二,民间社会对历史记忆的“发掘”是一个从个体记忆向公共记忆转换的过程。受难者遗骸的发

掘工作并没有停留在遥寄对父辈哀思的层次,而是有意识地走出个体,走出家庭,走向公共领域,致力于集体记忆的重新构建。恢复历史记忆协会和受害者团体已经开始提出社会甚至司法要求,并吸引了媒体的关注,从而提高了能见度。^④遗骸发掘工作通过报纸和电视纪录片成功地打破了人民的沉默,激活了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个体记忆,并于2002年转变为一场记忆爆炸运动。^⑤2005年,在马德里举办的一个图片展展出了33000名孤儿的图片,他们在战争期间流亡海外,被世界各地的家庭收养。关于那一时期的大量的自传、回忆录,还有小说、历史著作、影像资料、报刊文章,都在关注内战和佛朗哥时期的历史,这在西班牙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⑥

(三)加泰罗尼亚、巴斯克等地区的积极推动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西班牙在国家建构过程中遭遇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加泰罗尼亚、巴斯克等地区的分离主义倾向。尽管《西班牙宪法》通过承认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是享有“历史权利”的“民族”,并赋予它们以更大的自治权,将它们留在了单一制的国家框架之中,但是,这两个地区的分离主义倾向从未消除。2014年11月9日,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在公投法案被中央政府宣布违宪的情况下仍强行举行象征性“独立公投”,参加公投的200多万民众中有八成投票赞成独立。

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一直将自己视为佛朗哥政权的受害者,在恢复历史记忆的运动中非常积极。加泰罗尼亚、巴斯克的民族主义政党都试图通过官方对内战和佛朗哥政权的谴责来为自己平反,同时要求对以往被忽视的受害者予以承认。^⑦2000年,以加泰罗尼亚为代表的地方议会通过了对内战独裁受害者进行赔偿的法律提案,其立法维权进程远远领先于中央政府。他们通过这种形式对中央政府进行变相的施压,并在西班牙议会中极力推动恢复历史记忆的工作,是《历史记忆法》于2007年最后获得通过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将个人记忆转化为公共记忆的过程中,这些

地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纪录片《弗朗哥时代消失的孩子们》首先在加泰罗尼亚电视台公映,形象地向公众展示了弗朗哥时期由于政治原因被迫入狱的怀孕母亲和遗失婴童的悲剧,揭露了震惊西班牙乃至全世界的“盗婴案”丑闻。^⑧与此同时,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方政府还在自治区内树立了众多的纪念碑,向公众展示内战和弗朗哥政权的暴行。巴斯克已经成为拥有纪念碑最多的自治区,1987年至2017年间,为了揭露弗朗哥政权的暴行,共建造了35座纪念碑,其中,绝大部分(85%)是2006年以来建造的。巴斯克地区政府还出台了多项政策,一方面努力寻找和确认因战争暴力而失踪的人员,另一方面清除公共空间中弗朗哥主义的各种标志。巴斯克政府还先后推动成立了两个专门的机构——2014年成立的“记忆、共存与人权研究所”和2016年成立的“恐怖主义受害者纪念中心”——致力于历史记忆的保存,并提高受害者的“能见度”。^⑨

由于上述三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发掘历史成为一股新的潮流,2007年通过的《历史记忆法》强化了这一趋势。《历史记忆法》的内容包括:允许重审内战及弗朗哥统治时期的简易审判;开放公共墓地,寻找那一时期被丢弃的尸体;撤销以弗朗哥和弗朗哥分子命名的所有标志物;给予参加过国际纵队的外国人士西班牙国籍;在萨拉曼卡建立历史记忆档案中心;等等。当然,由于这部法律是各派政治力量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因此,它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它继续回避国家在揭示历史真相方面的责任,将寻找遗骸的工作委托给缺乏足够资源的地方民间组织。^⑩但这部法律确实标志着历史记忆的工作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19年2月,西班牙议会基于《历史记忆法》批准将弗朗哥的遗骸从马德里郊外的殉难谷迁出,转移到一个私人墓地,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⑪

结语:寻找历史记忆与正义的平衡

在社会科学意义上,记忆不仅指个人的记忆,还指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很大

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通过对记忆的社会建构,使社会成员享有共同的意义。这种经过社会建构所确立的集体记忆,不仅服务于集体认同的构建,而且还是一种政治工具,有助于确立群体内部的权力关系。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过去的历史,尤其是过去痛苦的历史,对于政治转型非常关键。在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阶段,基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机会结构,西班牙人选择遗忘策略,为民主的平稳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这一策略有其局限性:它是一种缺乏“正义”的转型,很多群体被排除在“民族和解”的进程之外,对民主的巩固和制度化缺乏政治正义的考量。^⑫因此,当其民主巩固的任务完成之后,西班牙人适时地转向了发掘策略,试图通过激活历史记忆来找回正义。然而,发掘策略同样存在着自身的局限。一方面,它很容易被政治化运用而沦为选举的政治工具。找回历史记忆的目标应该是通过重塑集体记忆强化国家认同,但在选举政治的驱动下,它很有可能背离原初的目标。另一方面,大量的电视报道、访谈甚至影视作品使得这场记忆运动成为一项“记忆产业”,而不是专注于回应受害者的呼吁。因此,有学者批评,恢复历史记忆的运动非但没有使西班牙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历史记忆问题上的矛盾得到缓和,反而使其越发尖锐。^⑬

一个民主转型之后的国家,绝对应该设法实践转型正义。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肯定转型正义,请不要忘记它只是人类社会诸多价值之一,它与其他价值可能存在冲突。何时、以何种方式来实现转型正义,这是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的重大考验之一。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忘记过去并不总是有损于民主,转型正义也并不是民主化的万能钥匙。而且,转型正义本身并不注定会走向民主,它甚至可能会成为民主化的障碍。^⑭在阿根廷,政府不得不终止军事审判,因为当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着手这一工作时,马上就激起了若干起武装叛乱,这使政府意识到这么做对于新兴民主政体的危险性。^⑮葡萄牙以清洗行动为特征的转型正义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事实

上的“猎巫行动”，由此导致的政治极化和内战幽灵，将葡萄牙新兴的民主制度置于危险之中。^⑥南非试图以“真相”来换取“和解”，但结果却是许多受害者在得知真相之后，终其一生无法原谅坦承犯下暴行的加害者，也无法接受国家法令对暴行坦承者的赦免。在一些拉美国家，真相不仅没有带来和解，甚至让社会陷于动荡之中。二战后，欧洲政治家强调将“遗忘”作为欧洲战后重建的一部分，认为刻意的遗忘是民主的基石。就像温斯顿·丘吉尔1946年在著名的“苏黎世演讲”中所言：“要想把欧洲从无尽的痛苦和近乎毁灭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我们就必须对欧洲共同体保持信仰，必须用遗忘来对抗所有过去的荒唐罪恶。”^⑦

有鉴于此，奥马尔·G·恩卡纳西翁(Omar G. Encarnación)感慨道，政治应该优先于正义。就像《特赦法》通过时西班牙《国家报》的社论所言：“一个民族不能也不应没有历史记忆，但历史记忆只应有助于促进面向未来的和平与共处的愿景，而不应助长旧日的仇恨。”^⑧回顾过去，是为了弥合伤痛、凝聚共识，从而巩固民主，而不是制造分裂。在通往转型正义的道路上，如何怀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审慎，寻找历史记忆与正义之间的平衡，确实需要政治智慧。

对于历史记忆，简单地“遗忘”是不够的，那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权宜之计，仅仅满足于“发掘”也是不够的，“发掘”只是唤醒历史记忆的第一步。更重要的事情是对历史记忆进行重新定义，并在此过程中将个体记忆整合进国家的集体记忆之中，以未来的愿景照亮历史记忆中的阴影。在这方面，德国人的做法值得借鉴：在城市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旧址建设纪念园区，在悼念的氛围中，将其打造成参访者“互相学习的场域”和“公民教育的场所”。通过参与式学习，参访者通过相互讨论，学习如何反思过去历史的错误，将情绪性、情感性的感受引导到用知识探索的方式深化自我反思，从而实现从情感到理性认知的转化。如果没有相互讨论，只是一味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性，与历史记忆相伴生的情绪感知相当容易沦为政治操纵的对象。^⑨

注释：

①目前中文文献仅见于安德鲁·瑞格比《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刘成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三章。此书的讨论仅限于西班牙民主转型初期，而未涉及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变化。另外，一些西班牙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会涉及历史记忆这一主题，并将其作为作品分析的背景。例如，冯雨菁：《哈维尔·马里亚斯与西班牙内战后历史记忆》，《外国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②据统计，内战期间牺牲的人有80万之多，其中，12.2万是平民，他们被故意地杀害，这些人中有81095人死于弗朗哥的暴力，37843人死于左翼力量的暴力。参见Paloma Aguilar, Laia Balcells, and Héctor Cebolla - Boado, "Determinants of Attitudes Toward Transitional Justi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panish Cas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10 (2011), pp. 1397-1430.

③安德鲁·瑞格比：《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刘成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13页。

④Paloma Aguilar, Laia Balcells, and Héctor Cebolla-Boado, "Determinants of Attitudes Toward Transitional Justi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panish Cas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10(2011), pp. 1397-1430.

⑤Paloma Aguilar, "Justice, Politics, and Memory in the Spanish Transition", in Alexandra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ález-Enríquez and Paloma Aguilar,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92-118.

⑥安德鲁·瑞格比：《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刘成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48-49页。

⑦Diego Muro, Gregorio Alonso, *Politics and Memor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Spanish Model*,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188.

⑧Omar G. Encarnación, *Spanish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 148.

⑨安德鲁·瑞格比：《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刘成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58-61页。

⑩Omar G. Encarnación, *Democratization Without Justice in Spain: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p. 71.

⑪Paloma Aguilar, "Institutional Legacie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The Case of the Spanish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Jeffrey K. Olick, (ed.), *States of Memory: Continuities, Conflict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National Retrospe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8–160.

⑫ Erik Zubiaga Arana, "Discourses and Public Policies on Memory: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Violent Past in the Basque Country(1936–2020)", in Antonio Mi'guez Macho, (ed.), *Sites of Violence and Memory in Modern Spain: From the Spanish Civil War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1, pp. 167–186.

⑬ Georgina Blakeley, "Digging Up Spain's Past: Consequences of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Democratization*, Vol. 12, No. 1(2005), pp. 44–59.

⑭ Omar G. Encarnación, *Democratization Without Justice in Spain: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pp. 198–199.

⑮ Georgina Blakeley, "Digging Up Spain's Past: Consequences of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Democratization*, Vol. 12, No. 1(2005), pp. 44–59.

⑯ Laura Desfor Edles, *Symbol and Ritual in the New Spa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fter Franc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5.

⑰ Laura Desfor Edles, *Symbol and Ritual in the New Spa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fter Franc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45–47.

⑱ Diego Muro, Gregorio Alonso, *Politics and Memor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Spanish Model*,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192.

⑲ Pamela Beth Radcliff, *Modern Spain, 1808 to the Present*,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7, pp. 231–232.

⑳ Paloma Aguilar, *Memory and Amnesia: The Role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2, p. 153.

㉑ Paloma Aguilar, "Justice, Politics, and Memory in the Spanish", in Alexandra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ález-Enrriquez and Paloma Aguilar,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92–118.

㉒ Omar G. Encarnación, *Spanish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 74.

㉓ Paloma Aguilar, Leigh A. Payne, *Revealing New Truths about Spain's Violent Pas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 6.

㉔ Diego Muro, Gregorio Alonso, *Politics and Memor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Spanish Model*,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 191–192.

㉕ Laura Desfor Edles, *Symbol and Ritual in the New Spa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fter Franc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7.

㉖ Laura Desfor Edles, *Symbol and Ritual in the New Spa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fter Franc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9.

㉗有人对此评论道：“如果卡里略没有善于把国家利益放在他的政党的利益之上，那么，毫无疑问，今天的西班牙民主生活不会像现在这样。”参见菲利普·努里《胡安·卡洛斯：共和派的国王》，杨恩瑞、赵铭贤译，昆仑出版社，1990年，第292页。

㉘ Laura Desfor Edles, *Symbol and Ritual in the New Spa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fter Franc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4.

㉙ Diego Muro, Gregorio Alonso, *Politics and Memor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Spanish Model*,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5.

㉚ Paloma Aguilar, "Justice, Politics, and Memory in the Spanish Transition", in Alexandra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ález-Enrriquez and Paloma Aguilar,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92–118.

㉛ Paloma Aguilar, "Justice, Politics, and Memory in the Spanish Transition", in Alexandra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ález-Enrriquez and Paloma Aguilar,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92–118.

㉜ Omar G. Encarnación, *Democratization Without Justice in Spain: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㉝ Georgina Blakeley, "Digging Up Spain's Past: Consequences of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Democratization*, Vol. 12, No. 1(2005), pp. 44–59.

㉞ Diego Muro, Gregorio Alonso, *Politics and Memor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Spanish Model*,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 192-193.

⑳ Diego Muro, Gregorio Alonso, *Politics and Memor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Spanish Model*,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 193-194.

㉑ Bonnie N. Field, Kerstin Hamann, (eds.), *Democracy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Spain in Comparat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60.

㉒ Bonnie N. Field, Kerstin Hamann, (eds.), *Democracy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Spain in Comparat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60-61.

㉓ Paloma Aguilar and Leigh A. Payne, *Revealing New Truths about Spain's Violent Pas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 14.

㉔ Emilio Silva Barrera, "Los trece de Priaranza: Mi Abuelo También Fue un Desaparecido", *La Crónica de León*, 8 October 2000, <https://memoriahistorica.org.es/los-trece-de-priaranza/>.

㉕ A. T., Más de 9.000 cuerpos de víctimas del franquismo han sido recuperados en 20 años de exhumaciones, 18 October 2020, <https://www.publico.es/politica/9000-cuerpos-victimas-franquismo-han-sido-recuperados-20-anos-exhumaciones.html>.

㉖ Robert Pogue Harrison, *The Dominion of the Dea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 93.

㉗ Jo Labanyi, "The Languages of Silence: Historical Memory, 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Witnessing in Contemporary Spain", *Journal of Romance Studies*, Vol. 9, No. 3(2009), pp. 23-35.

㉘ 冯雨菁:《哈维尔·马利亚斯与西班牙内战后历史记忆》,《外国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㉙ Paloma Aguilar, Leigh A. Payne, *Revealing New Truths about Spain's Violent Pas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 79.

㉚ Jo Labanyi, "The Languages of Silence: Historical Memory, 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Witnessing in Contemporary Spain", *Journal of Romance Studies*, Vol. 9, No. 3(2009), pp. 23-35.

㉛ Carlos Jerez-Farran and Samuel Amago, *Unearthing Franco's Legacy: Mass Graves and the Recovery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Spai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0, p. 5.

㉜ Diego Muro, Gregorio Alonso, *Politics and Memor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Spanish Model*,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193.

㉝ Anne E. Hardcastle, "El Documental es un Arma Cargada De Pasado: Representation in Documentary and Testimony", in Carlos Jerez-Farran, Samuel Amago, (eds.), *Unearthing Franco's Legacy: Mass Graves and the Recovery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Spai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0, pp. 148-155.

㉞ Antonio Mi'guez Macho, (ed.), *Sites of Violence and Memory in Modern Spain: From the Spanish Civil War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1, pp. 175-177.

㉟ Paloma Aguilar, Leigh A. Payne, *Revealing New Truths about Spain's Violent Pas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 14.

㊱ Antonio Mi'guez Macho, (ed.), *Sites of Violence and Memory in Modern Spain: From the Spanish Civil War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1, p. 15.

㊲ Paloma Aguilar, "Justice, Politics, and Memory in the Spanish", in Alexandra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ález-Enríquez and Paloma Aguilar,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92-118.

㊳ 冯雨菁:《哈维尔·马利亚斯与西班牙内战后历史记忆》,《外国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㊴ Omar G. Encarnación, *Democratization Without Justice in Spain: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pp. 188, 199.

㊵ Omar G. Encarnación, *Spanish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 148.

㊶ Omar G. Encarnación, *Democratization Without Justice in Spain: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p. 189.

㊷ 阿莱达·阿斯曼:《记忆还是遗忘:如何走出共同的暴力历史?》,《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

㊸ Omar G. Encarnación, *Democratization Without Justice in Spain: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p. 72.

㊹ 花亦芬:《在历史的伤口上重生——德国走过的转型正义之路》,先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25章。